

在讲述中重建：《海边》中的叙事与身份重构

薛梦茹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青岛

【摘要】古尔纳的小说《海边》深刻探讨了后殖民语境下的流散身份问题。小说以主人公萨利赫的流亡经历为主线，展现其身份在个人创伤、桑给巴尔的国族历史与英国庇护国环境的三重挤压下逐步走向解体的过程。身份的重建通过与他者展开对话式的“叙事”实践来完成。叙事不仅承载着创伤疗愈的功能，更构成了一个能够“生产”新自我的弹性空间。最终，在英国海滨小镇这一近乎中立的“第三空间”内，旧有的历史对立与身份壁垒得以消解，一种能够容纳矛盾、不被单一根源束缚的杂糅身份也由此生成。

【关键词】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海边》；身份建构；叙事；第三空间；杂糅性

【收稿日期】2026 年 8 月 15 日 **【出刊日期】**2026 年 9 月 3 日 **【DOI】**10.12208/j.sdr.20260075

Reconstructing through narration: Narrative and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in *By the Sea*

Mengru Xue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Abstract】 Abdulrazak Gurnah's *By the Sea* traces protagonist Saleh's identity disintegration under pressures of personal trauma, Zanzibar's national history, and his host country Britain. Reconstruction is achieved through dialogical narrative with the Other. Narrative not only serves a therapeutic function for trauma but also constitutes a space capable of "producing" a new self. A hybrid identity emerges in the English seaside town as a "third space".

【Keywords】 Abdulrazak Gurnah; *By the Sea*; Identity construction; Narrative; Third space; Hybridity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作品多聚焦于后殖民时代下东非沿岸人民的流散与创伤，精准捕捉了全球化时代中被边缘化的流散个体的生存状态。《海边》是古尔纳的代表作之一，以来自桑给巴尔的老人萨利赫·奥马尔抵达英国机场寻求庇护为开端，记述了其同为流散者的青年学者拉蒂夫·马哈茂德意外重逢，从而揭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家族恩怨。小说通过两位主人公延迟、破碎、充满沉默的叙事，呈现了后殖民语境下流散个体面对历史创伤、文化认同与身份重构的复杂过程。

1 多重挤压下的身份危机

斯图亚特·霍尔曾论断，身份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观念”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1]。身份不是稳定的位置关系，而是一种特定的叙事结构，是由话语建构的知识体系，其中隐含的是权力和利益关系^[2]。对于萨利赫而言，作为后殖民个体的他，其身份更是经历了一个从断裂到重构的过程。导致这场身份危机的根源并非是单一的错位，而是三重压力的累积

效应。根深蒂固的个人创伤、桑给巴尔后殖民历史的剧烈动荡，以及庇护国充满隔阂的社会政治环境，这些力量汇集在一起，将他抛入一种存在的虚空状态，难以找到归属感。

萨利赫的个人灾难是在一场宏大的国族创伤背景下展开的。1964 年桑给巴尔革命爆发，新革命政权发起的国家暴力彻底粉碎了他的公民与国族身份。这场革命推翻了苏丹的统治以及阿拉伯裔精英的主导地位，并随之释放出一波报复性暴力、财产没收与政治迫害的浪潮。桑给巴尔从此不再是归属之地，而是变成了一处关乎生死存亡的威胁场所。拉蒂夫的母亲阿莎跟萨利赫之间本来就有旧怨，在新政权上台后，她便唆使自己的情人——当时的发展与资源部长——利用职权密谋对付萨利赫。由于政府内部腐败和证据不足，萨利赫无法洗清冤屈，最终被判入狱。狱中的日子更加难熬，他长期遭受狱卒的羞辱、虐待和殴打，甚至染上了疟疾，一度濒临死亡。后来萨利赫回忆起那些痛苦经历时说：“岁月是

用身体语言来书写的，而我无法用语言表达。”^[3]在那段被囚禁的岁月里，妻子和女儿成了他精神世界仅存的锚点，令他在日复一日的屈辱中支撑下来。然而，当他历尽磨难幸存下来，准备回归家庭温暖的时候，迎接他的却是家人离世的消息。这道被至亲的死亡撕开的裂口，就此成为萨利赫生命中最深的创伤。创伤理论家凯茜·卡鲁斯曾指出，创伤不单指经历暴力事件本身，更是“一个伤口在呐喊的故事，它试图向我们诉说一种无法以其他方式呈现的现实或真相”^[4]。萨利赫的经历恰好能够印证这一点。那些刻在身体上的酷刑与失去至亲的剧痛，从未被真正讲述过，它们作为无法愈合的伤口，持续在他沉默的余生中呐喊。古尔纳将个人命运与政治变动交织在一起，由此展示出历史的转向如何让一个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沦为异乡人。萨利赫从一位富有的阿拉伯商人沦为备受批评的政治罪犯，他承受着时代剧变的创伤记忆。这场政治迫害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与祖国的关系，在肉身尚未离去之前，他的精神已被故土流放，沦为内部的流亡者、他者，丧失了生存空间，最终只能在六十五岁时去往其他国家寻求生存机会。

抵达英国之后，萨利赫并未找到能够修复破碎身份的避难所，反而陷入了第三重困境，使他的创伤雪上加霜。英国的庇护系统表面上属于一种人道主义机制，实际上却带来了一种新的非人化对待。在这个缺乏温度的庇护系统中，他不再是蒙冤的商人或政治异见者，而是被简化为一个通用类别——寻求庇护者。他从一个活生生的创伤个体，转变成为一个标准化的难民案例，成了福利国家的被动客体。难民机构安排他住进英国海滨小镇，可周遭的环境非但没有成为他走出困境的出口，反而把他推向了更彻底的孤立状态。尽管人身安全得到了保证，但他在文化上和社交上却漂泊无依。这种社会性的隐身状态，与他过去在桑给巴尔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不论好坏，他曾经都是一个处于密集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知名人物，而在英国，他则与任何能够确认其过往自我的社群都失去了联系。这种极端的匿名状态，结合他那悬而未决的过往创伤，最终造成了他身份的全面崩塌。数十年来，他既被难以言说的过去反复纠缠，又搁浅在一个拒绝看见他的当下。他对不公绝口不提，将痛苦内化，让沉默代替了诉说与控诉。这种沉默属于一种典型的创伤症状，多

里·劳伯将这种现象描述为“见证的崩塌”，即受害者无法清晰言说事件，导致创伤以萦绕不散的方式侵入到精神世界^[5]。萨利赫无法讲述自己的故事，也就无法将自己构建成一个连贯的主体。往事变成一个无法被吸收、持续溃烂的伤口，蛀空了他的当下。

2 叙事与主体性的重建

萨利赫的身份崩塌源于三重压力的叠加，而他的重建之路则始于一种行为：讲述自己的故事。来到英国以后，他并没有试图找回一个“真实”的旧日自我，而是在一次次向他人叙述的过程中逐步重获主体性。在古尔纳看来，叙事不只是在重现过往所发生之事，它本身也是一种创造世界、塑造自我的行为。

2.1 叙事的赋权功能

萨利赫初到英国时装作听不懂英语，由此进入了一种自主选择的沉默状态。这种缄默是他在桑给巴尔长期保持的沉默状态的延续，是源于创伤和对世界彻底丧失信任而形成的一种防御机制。《海边》中的关键转折点出现在萨利赫与故人拉蒂夫相遇之后，他决定打破这份沉默。拉蒂夫不仅同为逃往英国的流散者，还跟萨利赫之间有着复杂的家庭恩怨。正因如此，萨利赫选择向加害者之子讲述自己的过去，这一举动本身就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自我声张。他最初开口时话语断断续续、几度中断，语气里带着迟疑与勉强，却标志着他迈出了从客体转向主体的那一步。这番叙述从根本上重申了萨利赫的能动性，进而赋予他重建自我的力量。

多年以来，萨利赫被陷害、被监禁、被贴上难民标签，他的身份始终由那些强加于他的事件所定义。而在讲述这些事件的过程中，他重新夺回了对自身经历的意义阐释权。叙事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曾指出，人们正是通过叙事来创造和再造自我^[6]。萨利赫也正是借助言说，从一个历史的被动承受者，转变为自身意义的主动构建者。他的叙述实际上是在尝试把自己重新拼凑起来，努力“为自己辩护”，把那份被革命政权压制、难以言说的创伤和不公表达出来。同时，言说行为本身就是对那些试图抹杀他的力量的直接对抗。桑给巴尔的革命政权改写历史，将他排斥并妖魔化，而英国的官僚庇护机构则将他简化为一个难民编号。通过讲述自己具体而个人化的故事，萨利赫抵抗了这两种形式的抹除。他的声音曾经被压制，如今却成为了抵抗的场域。他的回忆不单单是怀旧，更是在重建一个曾经被暴力

毁掉的、有尊严的自我。

2.2 听众的角色

古尔纳并未将萨利赫的叙述呈现为一种对过去直白、客观的记述。相反，这段叙事当中充满了不可靠性和碎片化的特质。萨利赫断断续续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叙述时常迂回往复，有时刻意留下悬念，待到后续才缓缓揭示。但这种种“缺陷”并非叙事上的失误，恰恰是古尔纳理解身份建构的关键，因为它们如实反映了创伤记忆的本质。创伤理论家凯茜·卡鲁斯对此早有论述。她指出，创伤记忆并非以线性叙事的形式整合在一起，而是以侵入性的、非连续的碎片形式出现^[4]。萨利赫支离破碎的讲述方式，正是对他破碎心灵的模拟再现。

叙事的不可靠性不仅是创伤的症状，它同时构成了一个可供身份协商的、带有生产性的空间。萨利赫并不是在简单地回忆一个固定的昔日自我，而是在言说的当下主动地创造自我。他讲述的每一个版本的故事，都是一次不同的身份操演。当萨利赫讲述往事时，拉蒂夫会拿出自己的说辞与之对质，迫使他重新审视并重叙过去。这种叙事的流动性表明，身份从来不是一个稳定、单一的实体，而是在记忆、反记忆与当下语境的持续协商中动态生成的。它的“真相”也不在某个单一的故事里，而藏在多个叙述之间充满张力的相互作用里。

萨利赫的身份重建并非是一场独角戏，它本质上是一个对话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拉蒂夫作为倾听者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肖莎娜·费尔曼指出，证言行为既需要讲述者，也需要见证者，二者共同创造一个主体间性的事件。创伤后的自我重建不仅需要讲述者的发声，更需要一个能够接收、回应并承认真相的见证者^[7]。拉蒂夫不是萨利赫故事的被动容器，而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他的提问、打断、质疑和反叙事，都在不断地塑造萨利赫的讲述方式与讲述内容，进而也塑造了那个正在讲述中重新生成的自我。在这个意义上，拉蒂夫的在场使萨利赫的叙事从一个封闭的独白，转变为一个开放的、具有修复力的对话。

这种对话式的交流同时改变了讲述者和倾听者。萨利赫在言说中不仅重构了自己，也为拉蒂夫补全了一段他从未知晓的家庭历史。而拉蒂夫则通过倾听与诘问，帮助萨利赫从一个不同的视角去审视自己的故事，由此获得了一种更细致、更完整的自我

认知。两人从互相猜疑到彼此和解，这个变化恰好映照出萨利赫内心慢慢疗愈的过程。他的身份并非在孤立中重建，而是在连接中重生。这部小说有力地证明，在经历严重创伤后，一个人若要重新成为一个主体，那么他不仅要言说，还必须被倾听、理解，乃至被挑战。拉蒂夫对萨利赫的倾听与回应，并非消极的无所作为，而是一种积极的伦理担当。他为萨利赫构建了一个安全的伦理空间，使创伤的讲述成为可能，就连沉默也升华为一种深度共情与接纳的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二人的伤痛获得了疗愈的可能。

3 杂糅身份的形成与和解

霍米·巴巴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概念，特指一个固定的文化和历史二元对立开始瓦解的过渡地带^[8]。那个起初让萨利赫倍感异化与疏离的英国海滨小镇，后来恰恰被转化为这样一个第三空间。正是在这个阈限空间内，萨利赫和拉蒂夫得以超越过去所背负的僵化身份，从而锻造出一种“杂糅身份”。这种新身份并非简单的折中或混合，而是一种复杂的、关系性的存在状态，充满了模糊性和相互依赖性。

小说中英国海滨小镇的设定，对于故事主题的展开至关重要。最初，它代表了流亡，灰暗、寒冷、充满隔阂。对于萨利赫而言，这是一个毫无归属感的空间。然而，随着他与拉蒂夫的叙事相互交织，这个小镇逐渐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从一个简单的地理位置，转变为一个隐喻性的第三空间。霍米·巴巴认为第三空间是一个关于陈述行为的场域，在这里，文化意义和身份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永远处于协商与转换的过程之中^[8]。《海边》中的海滨小镇正是以这种方式发挥作用。它像一片中立地带，脱离了桑给巴尔复杂而沉重的历史与社会语境。在桑给巴尔，萨利赫是被剥夺财产的阿拉伯商人，拉蒂夫则是与新政权结盟的仇敌之子。他们的身份早已被写好脚本，真诚的互动将无从谈起。而英国，作为一个共同的流离失所之地，瓦解了这些僵化的二元对立。在这里，他们都只是流亡者、移民、“外国人”，共同面对着一个陌生的现实。这种共通的他者处境，创造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亲密空间，剥去了他们旧有的社会盔甲，迫使他们作为赤裸的个体去面对彼此，而非作为历史符号的化身。萨利赫的公寓正是第三空间的缩影。它仿佛是在英国背景下移植的一片桑

给巴尔，一个可以讲斯瓦希里语、可以倾诉昔日冤屈、分享文化记忆的空间。两个来自历史冲突对立的人，如今在一间小小的英国公寓里分享茶点与故事，这正是第三空间运作的有力例证。这个场域，让新的可能性得以生成。

在这个赋能的第三空间内，浮现的并非是旧有身份的回归，而是一种全新杂糅身份的创造。杂糅性并非两种文化的和谐融合，而是一个“矛盾的‘第三种状态’”。萨利赫与拉蒂夫最终获得的杂糅身份，是在二人对话性的相遇以及共同的流离状态这个熔炉中锻造出来的。萨利赫的新身份不再仅仅由他在桑给巴尔的过去所定义，也没有被同化到英国社会中。他成为一个存在于这两个世界“之间”的人物。他保留着自己的记忆、语言和文化实践，但这些如今都被新的语境所重新框定。他是一个从历史中幸存下来而非抹杀历史的人；他既是受害者，也是对加害者之子展现出理解；他既是桑给巴尔记忆的守护者，也是英国海滨小镇的居民。这个杂糅的自我，既关联着故国的记忆空间，又适应着接纳国的转换空间，容纳着这些看似矛盾的身份面向^[9]。

拉蒂夫的身份也经历了类似的杂糅化过程。他初抵英国时，其身份完全由父母抱怨的叙事以及桑给巴尔后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所塑造。而与萨利赫的相遇，解构了这份被继承的身份。他听到了故事的另一面，这迫使他重新评估父亲和自己的过去。他的主体性，在他所受的西方学术训练、所继承的桑给巴尔历史，以及萨利赫强有力的反叙事这三者的交汇点上被重塑。往事，这个一度象征着分裂与背叛的符号，被转化为连接与未来可能性的纽带。萨利赫与拉蒂夫“从海边而来”，最终又抵达了“海边”，这个地点不再意味着失落与孤立，而成为一个建立连接、获得平和的空间。

4 结论

本文追溯了古尔纳小说《海边》中身份重建的复杂轨迹，论证了小说所呈现的主体性并非一个等待被复原的固化本质，而是一个通过叙事行为得以重建的动态化过程。文章首先分析了个人创伤、桑给巴尔的政治动荡以及英国非人化的庇护系统，这三重压力如何摧毁了萨利赫的身份。接着，文章转向萨利赫如何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一叙事行为来重建自我。他的叙述并非对事实的精准复述，而是一种创造新自我的主体性实践。在此过程中，拉蒂

夫作为倾听者的存在至关重要，他将一场独白转变成了共同创造的互动。二人在英国海滨小镇这一中立的“第三空间”中消解了矛盾，发展出一种新的、杂糅的身份。古尔纳向读者展示了，对于那些被历史洪流抛离的个体而言，通往自我之路并非回归一个失落的本源，而是通过叙事这一艰难而必要的行为，将自我认同感重新建立起来，从破碎过往的瓦砾中重建一个新自我。

参考文献

- [1] Hall, S.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C]// Luo Gang, Liu Xiangyu (eds.). *Cultural Research Reader*.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0: 208-223.
- [2] 徐明玉. 文化身份与文化身份批判的“问题”——兼论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批判的维度与方法 [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53 (6): 112-120.
- [3] 古尔纳. 海边 [M]. 黄协安,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2.
- [4] Caruth, C.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 [5] Laub, D. Bearing Witness, or the Vicissitudes of Listening [C]// S. Felman & D. Laub. (eds.). *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57-74.
- [6] Bruner, J. 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J]. *Critical Inquiry*, 1991, 18 (1): 1-21.
- [7] Felman, S. The Return of the Voice: Claude Lanzmann's Shoah [C]// S. Felman & D. Laub (eds.). *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204-283.
- [8] Bhabha, H.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M]. London: Routledge, 1994.
- [9] 高文慧. 古尔纳《海边》中跨国难民的身份叙事 [J]. 外国文学研究, 2022, 44 (5): 31-42.

版权声明：©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